

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

程俊杰^{1,2}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13)

内容提要:发展民营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本文以江苏为例,分析了民营经济演变、发展的内在机制,认为制度变迁所产生的激励结构变化将诱使企业家精神的配置方向、释放程度发生演变,并通过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创业行为,引领民营经济规模、结构、创新等的塑造与发展。实证研究发现,制度质量的提高、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对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领域的配置程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领域的配置程度对于民营经济的规模壮大、创新驱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民营经济盈利能力或价值链地位具有负面影响,对于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取决于产业平均收益。

关键词: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民营经济;江苏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6)08—0039—16

一、问题提出

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中央及时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两大现实问题:一是有效供给不足;二是产能过剩。从理论上讲,以上问题实际上是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低下且不断下降的宏观表现。民营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天然基因,是整体经济中最活跃、最有效率、最具有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好民营经济,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解决供给侧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江苏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与浙江、广东等地原生型属性不同,江苏民营经济基本是由乡镇企业及一部分国有中小型企业经过改制而来,因此,它是次生型的(程俊杰、刘志彪,2012)。作为“江苏模式”的主要特色和内涵,它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且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研究其成长、演进的内在机制,不但有利

于自身的转型升级,而且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更具普适意义。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民营经济的研究很多,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是分析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困难、转型路径、方向及对策等(丁任重、孙根紧,2011;洪银兴,2012;包国宪、李毅,2012);二是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宏观影响等(韩坚、钱濛,2012;才国伟等,2012;褚敏、靳涛,2015)。对民营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研究仍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目前,一个达成广泛共识的观点就是,政府在驱动国内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所以会出现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主要与上下级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Shih, 2008;章奇、刘明兴,2012)、政府的干预能力(Barro, 1996)、不同的地理环境(Sachs等,2002)、文化(Weber, 1930)、政治制度(Acemoglu等,2015)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前期研究成果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本文认为,企业家

收稿日期:2016-05-18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苏所有制结构协同发展实践研究”(15@ZH03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有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研究”(15ZDA026);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增创更具活力、更有效率的江苏改革开放新优势研究”(13WTB021)。

作者简介:(1983-),男,江苏东台人,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长三角区域经济, E-mail: topcj2003@163.com。

精神才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差异造成了各地民营经济在企业数量与规模、经营效率、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制度变迁则是导致企业家精神发生演变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一核心思想,本文试图构建“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以此厘清江苏次生型民营经济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论证,进而为江苏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实现结构优化与创新驱动提出政策建议。根据所掌握的文献,已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制度变迁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等的单独研究,而本文则尝试将“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三个研究范畴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故而亦具备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典型事实与理论框架:基于江苏的分析

1. 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

(1) 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孕育期、成长期以及成熟期。第一阶段孕育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江苏次生型民营经济的最主要母体之一就是乡镇企业。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并明确表示要大规模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江苏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一机遇,实现了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的升级,乡镇经济迅速崛起。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二是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第二阶段成长期(20世纪90年代)。进入90年代,一方面,民营经济开始由“补充”地位升格为“并存”和“共同发展”地位,意识形态争议逐渐平息;另一方面,面对“落地”外资企业的竞争冲击,乡镇企业由于技术落后、管理混乱、布局零散、生产成本高等原因,逐步陷入效率低、债务重和亏损增加的困境,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大批乡镇企业纷纷改制,成为了民营经济发展初期的骨干力量,并通过与国内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发展出颇具活力的股份制经济。第三阶段成熟期(21世纪以来)。新世纪以来,在各地政府的重视与扶持下,江苏民营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并在不少领域实现了对广东、浙江等原生型民营经济“前辈”的弯道超车。目前,江苏民营企业构成中已

经形成包括民营科技企业、改制后的次生型民营企业、原生型民营企业以及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内的多元结构,而不再是改制企业一家独大的一元结构。资料显示,江苏民营科技企业数量已占到民营企业总量的10%;不少地区,如苏州,次生型与原生型民营企业的数量基本各占半壁江山。这一时期,江苏民营经济呈现出园区经济和板块经济(如江阴板块、常熟板块、盛泽板块等)的主要特色。

纵观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论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还是民营化改制的华丽转身,亦或是园区经济、板块经济的横空崛起,都是在地方政府强有力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实现的,因此,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也正因为如此,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短时间内、低成本追赶与超越。但这种带有粗放痕迹的发展也日益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不少民营企业从事国际代工,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的危险;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为避免江苏民营经济发展陷入衰退,迫切需要及时转换发展动力,即由原先的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 基本特征。根据统计资料,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目前江苏民营经济主要体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整体民营经济规模较大。2014年,江苏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为江苏地区所创造,这一规模也超过浙江,与广东基本持平,但增速超过广东0.8个百分点。从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来看,江苏为53.8%,高于广东(51.7%),低于浙江(70%)。可见,江苏展现出明显的赶超势头。但从企业规模来看,包括江苏在内的江苏民营企业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5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江苏入围91家,而浙江则有138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中,江苏有1206家,而浙江达到1494家。因此,江苏民营经济的体量特征可以基本概括为“总体规模较大,个体规模较小,大企业较少”。

第二,第二产业比重较高。从产业结构来看,2014年,江苏民营经济中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17878亿元,占三产比重为50.4%,超过第三产业4.3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仍处于由“二三一”向“三二一”演进的过程中,这一基本特征同样适用于江

苏地区。而广东民营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浙江民营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甚至已超过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和。这一现实与江苏,特别是江苏近现代以来的工业传统、民营化改制前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以及独特的企业家精神等密切相关。

第三,社会创业活动比较活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私营企业户数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底,江苏工商部门注册私营企业户数累计达到157.4万户,多于浙江(111.2万户)、上海(113万户),位居全国第二。二是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明显扩大。注册资本总额达5.6万亿元,仅次于广东;户均注册资本提高到355万元,增长8.2%。三是民间投资平稳增长。2014年,民间投资2.8万亿元,同比增长14.8%;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完成工业投资1.2万亿元,增幅比全省工业投资增幅高11.6个百分点。

第四,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从宏观环境来看,江苏R&D经费支出、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等均位于全国前列,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微观企业来看,江苏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迅猛,无论企业数量,还是技工贸总收入均跃居全国首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速高于广东、浙江等地,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江苏地区。但另一方面,江苏民营企业的管理创新能力可能相对较弱,最新的中国品牌500强中,江苏民营品牌只有25个,远低于广东、浙江。

2. 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继熊彼特开创性的研究之后,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普遍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一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结合以上回顾与概括,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演变及基本特征塑造的根本动力。虽然政府的有形之手几乎无时不在,但是,有形之手也是需要通过影响无形的企业家精神来引导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属于制度的范畴。根据理论,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有:一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比如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等;二是偏好的变化,Boyd & Richerson(1985)提出的影响制度变迁的三大因素(事故、学习、自然选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对比江苏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的差

异,可以发现,前者由于基层政权实力很强,地方政府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和基础设施,并能组织起大量优质资源,故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江苏各地乡村都在规划工业园,开展招商引资。后者基层政权实力则相对较弱,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其路径往往是自下而上。比如温州的民间金融非常发达,以家族纽带为基础的小作坊发展起来后纷纷出走,最后发展到投机盛行以及本地产业空心化。

正如诺斯(1994)所说,组织和企业家所从事的有目的的活动是制度及其变迁的代理实体。制度框架本质上提供了一个激励结构,这决定了企业家活动的方向和密度(Baumol,1990)。波特(2002)亦认为,制度是指引创新活动和思想往适当方向发展的神经中枢,是企业家在技术和方法上快速创新的动力来源。其中,企业家精神则是制度影响组织和企业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制度的地区差异及其变迁导致企业家精神会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产生差别。这一观点也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证实(Lu & Tao,2010;Garello,2014)。本文对江苏、浙江、广东三地的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测度比较(如图1和图2所示),分别从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个方面选择指标(Hebert & Link,1989),即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自我雇佣率(个体和私营企业主占就业人口比重)。2008年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基本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虽然江苏全部门研发投入强度要高于浙江、广东,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明显低于浙江,说明江苏的创新投入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三地自我雇佣率的走势也大体相同,但江苏显著低于浙江,且近几年差距有扩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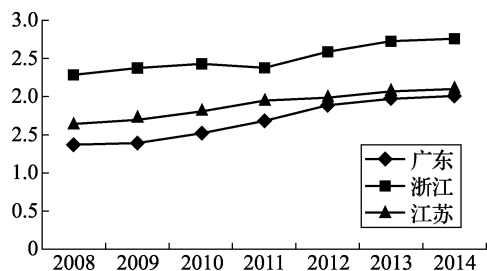


图1 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三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一般来说,企业家精神影响民营经济发展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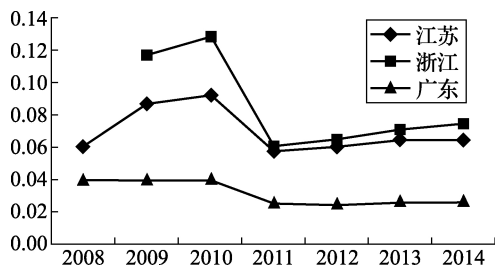


图2 广东、浙江、江苏三省自我雇佣率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三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有两大机制:一是创新机制;二是创业机制。具体包括:

第一,创新与增长。创新影响民营经济增长大体有四种途径:技术进步。其对民营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体现为增长效应,即技术进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产出的增加;冲击效应,即根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技术进步还会引起经济波动。产品多样化。产品多样化可以通过消除产品需求波动来增强民营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也可以增进分工专业化程度,从而提高民营企业生产效率。此外,还能创造出更多消费市场,激发有效需求,进而促进增长。要素高级化。不少研究表明,创新有利于提高要素质量、促进要素积累,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组织创新。一方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组织内部运行效率,进而提升民营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结构性矛盾,保持民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第二,创新与产业结构。创新对民营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有三条路径:分配效应。创新带来总产出的增加,但是,具体到不同产业、企业和个体,其收益是不同的。创新打破了原先的分配格局,制造了新的垄断,因此,势必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和企业间重新进行配置,从而促进产业结构演变。创新投入结构。创新可以通过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的投入方向、规模等以及其产生的“乘数效应”,调整增量部门和存量部门在民营经济中的比重,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因此,不同地区创新投入的差异也部分解释了产业结构的差别。要素结构。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改变了要素质量和结构,比如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这会诱使要素进行优化、整合,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进化。

第三,创业与增长。无论是经济观察,还是理论研究都表明,创业活动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具有促

进作用。其促进机制基本包括:企业成长。创业企业成立后很可能进入高速发展通道,从而助力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例如,阿里巴巴成立于1999年,到2001年底就已经成为全球首个达到100万注册会员的B2B电子商务网站,2014年成功在纽交所挂牌上市;Facebook创立于2004年,2010年就超过雅虎成为全球第三大网站,成长速度非常惊人。知识溢出。创业机会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受知识的影响,创业实践则提供了知识溢出的可能,这恰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促进竞争。创业通过增加企业数而增强了竞争程度,这会刺激创新(张杰等,2014)。一方面,竞争比垄断更有助于知识扩散(Jacobs,1984);另一方面,竞争会产生创新的压力,降低创新的绝对收益。企业多样化。企业种类的多样化除了增加知识的外部性外,还可以有助于市场发现,从而增加增长潜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创业的过程很可能也是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这就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增长。

第四,创业与产业结构。国际经验表明,创业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进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创业,特别是科技创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比如,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提出要成为创业之都,并使之成为创业企业遍布的城市。国内的深圳提出要成为中国高科技创业圣地,上海也喊出了打造创业之都的口号。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主要有:收入分配。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创业企业一般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及成长期,相对于成熟期的企业具有较快的成长速度,加上其生产出的产品往往针对的是潜在市场需求,因而较易占领空白市场,并以此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会诱使生产要素发生部门间的转移,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新产业部门产生。创业创造了出新的产业部门,其生产的新产品或服务替代原有的产品,一方面造成旧的产业部门的衰退;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其上下游产品部门的发展。

进一步,Baumol(1990)率先关注到企业家精神的配置问题,并指出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差异化配置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同影响。受此启发,本文认为,江苏次生型民营经济发展、演进的内在机制可以概括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所产生的激励结构变化诱使企业家精神的

配置方向、释放程度发生演进,进而通过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创业行为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企业家精神配置方向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区别,二是企业投资的具体产业、领域等。具体来说,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演进的内在机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是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政治制度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1)强政府属性始终不变。江苏是强政府的典型地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关键生产要素和资源,比如土地、环境、信贷等。虽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主导发展的能力依然相当强。在地方竞争的背景下,这会诱使企业家精神向具有政府偏好的领域进行配置,加上很多江苏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具有“红顶”背景,比如不少人曾经就职于政府机关、担任过村干部等,能够有效调动和整合资源,从而使得江苏的民营经济虽然并非原创,但发展较快、规模较大。(2)政府效能不断改善。强政府滋生了腐败的土壤,这对生产性活动领域的企业家精神产生了负面影响,促使其向非生产性活动进行配置,比如寻租。但随着近几年中央反腐败力度的加大,政府效能得到有效提升,江苏民营经济质、量均得以迅猛发展。

二是经济制度。一句话概括江苏经济制度的演进内容和特征就是:放松经济性管制,推进市场化进程。2009年,江苏的市场化指数就已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落后于浙江、广东而一跃成为全国各省市首位。这就可能产生两个变化:民间资本的盈利机会增多与企业家承担商业性风险的意愿增强。从而使得企业家精神得到激发和恢复,并引导其配置到生产性、盈利性领域,所以可以看到,目前江苏地区社会创业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资本投向正逐渐

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

三是文化制度。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江苏文化的特质大体包括这样几个关键词:规避政治风险、温和勤劳、尊师重教、善于变通、开放等。其影响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1)规避政治风险使得江苏,特别是江苏的企业家精神在民营经济体制“松绑”之后才逐渐由乡镇企业转移配置到民营经济。(2)江苏人温和勤劳,不激进,不冒进,这一方面使得企业家精神中创业精神较强,通过踏实苦干实现民营经济后发赶超;另一方面也导致企业家往往进入具有比较优势或熟悉的领域,比如制造业。(3)江苏文化底蕴深厚,教育、科研资源丰富,这就给民营科技企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4)江苏人历来注重开放,善于变通和学习,这塑造出独特的企业家精神,体现在企业家创业和创新活动中,比如民营企业往往擅长于与政府处理好关系,为企业发展寻求政府支持;擅长于学习模仿,借鉴别人的发展经验进行“弯道超车”;擅长于通过国际代工,迅速且低成本实现自身技术、资本的原始积累等。

四是法律制度。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基本贯穿了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化:(1)尊重契约精神;(2)保护私有财产;(3)保护知识产权。这些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本质上讲是形成了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成为影响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例如,契约精神的形成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确认降低了企业家创业行为的不确定性,激发了其将发现的盈利机会付诸实现的意愿。同样,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法律角度确定了创新所获垄断收益的合法性,亦增强了企业家的创新意愿。这也成为江苏民间创业投资十分活跃、民营企业创新活动成绩斐然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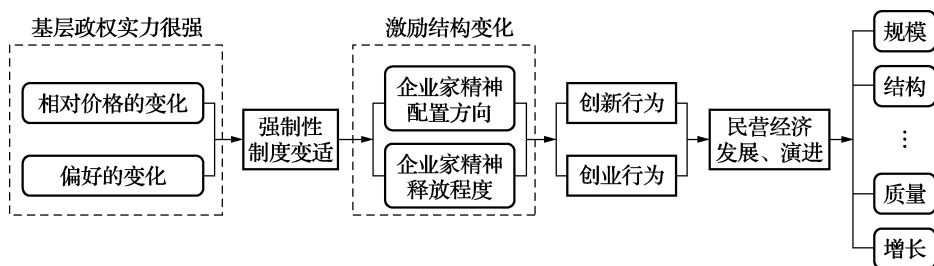


图3 江苏次生型民营经济发展内在机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样本、变量与指标选择

1. 样本说明

应该说,江苏次生型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地区,区别仅仅在于制度及其变迁的不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企业家精神的差异。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民营经济发展机制,拟采用2000—2014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之所以选择省级样本,主要基于三点考虑:(1)同一省辖范围内的制度及其变迁、企业家精神基本是同质的,更微观的行政区划中可能会出现所有制、产业等结构单一的现象;(2)省级作为我国政府体系中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枢纽,往往是制度变迁的重要主体;(3)从数据搜集的角度来看,省级层面的数据可得性比较完备。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及各省统计局网站、《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两方面处理:一是样本选择31个省市自治区,剔除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二是对于缺省数据采用插值、外推、替代等方法进行补齐。

2. 变量与指标选择

(1)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实证研究对其的处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于某项具体制度的执行,从时间、行业、地区等维度引入虚拟变量,或者基于制度执行前后、涉及范围等角度对样本进行分拆研究。二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测算制度质量指数。受此启发,本文对制度变迁的衡量分两个层面:采用市场化指数和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两个指标测度总体层面的制度质量;采用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以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表示金融发展、开放程度以及城市化水平。

(2)企业家精神。经济学文献对企业家精神的讨论主要有三个经典流派,分别是:强调创新精神的德国学派、注重风险承担能力和冒险精神的新古典学派以及关注对市场机会识别能力的奥地利学

派。基于此,实证研究一般将企业家精神划分为两个方面: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遵循这一思路,结合Baumol提出的企业家精神配置问题,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企业家精神进行衡量: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更多的应该指的是创新意愿,而非创新能力、创新绩效,故采用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进行测度。二是沿用多数文献对创业精神衡量所选用的自我雇佣率指标,即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三是用私营企业产值与国有企业产值之比替代表示企业家精神的配置情况,国有企业是一种强制性的政策工具,故带有较强的非生产性属性。

(3)民营经济发展。多数文献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度量仅仅停留在总量规模层面,本文拟从总量规模、产业结构、创新驱动能力以及价值链地位四个方面对此进行刻画:采用私营企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民营经济的发展规模;用二次产业增加值与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描述产业结构;创新驱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创新绩效上,不少文献选择用专利申请或授权量来进行衡量,本文更关注创新产业化后的绩效,故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价值链地位主要体现为盈利能力,故采用私营企业利润额占总产值比重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根据理论,某一地区的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还会受到要素禀赋、区位条件、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借鉴相关文献的处理方法,选择以下控制变量:用单位国土面积的煤炭、石油储量代表资源禀赋;用单位GDP的资本存量来表示资本禀赋;^①用单位国土面积所拥有的人口数衡量劳动力禀赋;用单位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来代表教育水平;用单位国土面积所拥有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里程数来表示基础设施水平和区位条件。

(5)描述性统计。表1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各项指标的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可以发现,我国各省份在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这也为本文提出的民营经济发展内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①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以1990年为基期。

表 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	符号	计算说明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制度变迁	市场化指数	<i>market</i>	樊纲等(2011)	465	6.5341	2.3436	0	11.8000
	政府配置资源	<i>expenditure</i>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465	0.2098	0.1613	0.0689	1.2914
	金融发展	<i>finance</i>	金融增加值占 GDP 比重	465	0.0442	0.0260	0.0064	0.1715
	开放程度	<i>trade</i>	进出口额占 GDP 比重	465	0.0437	0.0547	0.0044	0.2444
	城市化水平	<i>urban</i>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465	0.4612	0.1611	0.0046	0.8961
企业家精神	创新精神	<i>R&D</i>	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 比重	465	0.0088	0.0051	0	0.0258
	创业精神	<i>selfemployment</i>	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数占就业人口比重	465	0.2850	0.0944	0.0806	0.5826
	配置方向	<i>state</i>	私营企业产值与国有企业产值之比	465	0.4444	0.1767	0.0475	0.9427
民营经济发展	经济规模	<i>private</i>	私营企业产值占 GDP 比重	465	0.2364	0.2205	0.0026	1.0401
	产业结构	<i>structure</i>	二产增加值与三产增加值之比	465	1.2120	0.3304	0.2733	2.0228
	创新驱动	<i>new</i>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产值比重	465	0.1113	0.1047	0.0015	1.7410
	价值链地位	<i>profit</i>	私营企业利润额占产值比重	465	0.0613	0.0506	-0.0293	0.4823
控制变量	资源禀赋	<i>resource</i>	单位国土面积煤炭、石油储量	465	0.4642	1.1258	0	6.7915
	资本	<i>capital</i>	单位 GDP 资本存量	465	0.5493	0.1525	0.2950	1.3040
	教育水平	<i>education</i>	单位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465	0.1360	0.0719	0.0212	0.3565
	基础设施	<i>infrastructure</i>	单位国土面积铁路、高速公路里程数	465	0.0361	0.0368	0	0.2063
	劳动力	<i>population</i>	单位国土面积人口数	465	0.0409	0.0590	0.0002	0.3851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本文的实证研究拟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是检验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然后是检验企业家精神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

1.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精神

(1) 计量模型。考虑到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创业以及配置三个方面,为了验证制度变迁对其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entrepreneurship_{it} = \alpha_0 + \alpha_1 institution_{it} + \psi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表示地区, t 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 *entrepreneurship* 表示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配置三个方面;解释变量 *institution* 表示制度变迁,包括总体层面的市场化指数、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以及具体层面的金融发展、开放程度以及城市化水平; Z 为控制变量的合集,包括资源禀

赋、资本、劳动力、教育水平以及基础设施五个方面; ε 为随机误差项。回归之前,首先要检验方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否则可能导致变量系数的偏差和不稳定。本文计算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发现相关系数基本都小于 0.4,并未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经过 Hausman 检验,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如表 2 所示)。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逐个放入控制变量发现变量系数的符号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显著性检验情况一致;二是考虑到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考察了滞后一期的制度变迁变量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2) 实证结论。根据回归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制度变迁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市场化指数与企业家创新精神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家的创新意

愿。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一是市场化减小了创新资源及要素的流动摩擦,促使其更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优化配置;二是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执行的完善;三是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等公共科研机构在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进行更好的分工、协作;四是市场化减少了企业与创新要素供给方之间的搜寻和匹配成本。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与企业家创新精神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指标反映政府配置资源的程度,说明政府支出越大,越不利于创新,这与不少文献的实证结论相符,也间接证明了以上结论的可靠性。金融发展与企业家创新之间的系数为正,但遗憾的是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当前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家创新意愿的促进效应并不明确。而国外学者普遍

认为,金融发展对于企业家创新具有积极作用,其作用途径包括:项目选择、资金输送、风险转移分散以及潜在收益揭示(King & Levine, 1993)。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然是银行主导型,信贷配给现象广泛存在,此外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潜在影响,而市场主导型金融则更有利于促进创新。以贸易衡量的开放程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之间的关系同样不显著。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以中间品进口为特征的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促进创新,而国际代工却会由于国内企业可以获得低成本的快速增长而减弱创新意愿。城市化水平与企业家创新精神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制度的创新、高级要素的集聚、信息网络的形成、基础设施的提升等都有利于刺激企业家创新意愿的释放。

表 2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精神关系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企业家创新精神(R&D)					企业家创业精神(selfemployment)					企业家精神配置(state)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方程8	方程9	方程10	方程11	方程12	方程13	方程14	方程15
market	0.0010 *** (0.0002)					0.0196 *** (0.0026)					0.3318 *** (0.0214)				
expenditure		-0.0045 * (0.0026)					0.0791 *** (0.0218)					-1.3256 *** (0.223)			
finance			0.0218 (0.0133)					0.2397 *** (0.0681)					5.1506 *** (1.5318)		
trade				0.017 (0.011)					-0.289 *** (0.0551)					3.8219 *** (1.2737)	
urban					0.004 ** (0.002)					0.0128 (0.0093)					0.5389 ** (0.2289)
resource	0.0042 *** (0.001)	0.0044 *** (0.0010)	0.0045 *** (0.001)	0.0044 *** (0.001)	0.0047 *** (0.001)	-0.0143 *** (0.0021)	-0.0169 *** (0.0023)	0.0293 *** (0.0068)	0.0248 *** (0.0067)	0.0205 ** (0.0085)	-0.0151 (0.0115)	-0.0909 *** (0.0133)	0.4191 *** (0.1123)	0.4029 *** (0.1127)	0.4467 *** (0.1137)
capital	-0.0029 * (0.0015)	-0.0029 * (0.0017)	-0.0051 *** (0.0016)	-0.0039 *** (0.0015)	-0.0041 *** (0.0015)	0.2290 *** (0.0280)	0.0927 *** (0.0329)	0.0613 *** (0.0154)	0.072 *** (0.0168)	0.0756 *** (0.0168)	1.1136 *** (0.1684)	0.6515 *** (0.2273)	-0.1757 (0.1812)	0.1093 (0.1757)	0.0478 (0.174)
education	0.0147 ** (0.0073)	0.0103 * (0.0053)	0.0098 * (0.0052)	0.0059 (0.0056)	0.0054 (0.0055)	-0.0555 (0.0969)	0.3062 *** (0.1011)	0.2018 *** (0.0348)	0.2328 *** (0.038)	0.1626 *** (0.0295)	2.5451 *** (0.4899)	2.7797 *** (0.7315)	3.4595 *** (0.6031)	2.5638 *** (0.6427)	2.7734 *** (0.6361)
infrastructure	0.1053 *** (0.0228)	0.0973 *** (0.0233)	0.0901 *** (0.0242)	0.1061 *** (0.0235)	0.0937 *** (0.0235)	-1.1235 *** (0.2770)	-0.9217 *** (0.3298)	-0.5727 *** (0.1099)	-0.4817 *** (0.0831)	-0.3789 *** (0.1394)	-1.0741 (1.4721)	-0.5094 (2.353)	26.1411 *** (2.7872)	29.8652 *** (2.7128)	27.7441 *** (2.7288)
population	-0.1537 *** (0.0302)	-0.1179 *** (0.0304)	-0.1208 *** (0.0303)	-0.1396 *** (0.0316)	-0.1369 *** (0.0307)	-0.0196 (0.1416)	0.0646 (0.1662)	0.2317 ** (0.0947)	0.4426 *** (0.0896)	0.1097 (0.1384)	-3.9023 *** (0.6793)	-1.0279 (0.9932)	-32.4946 *** (3.4906)	-36.7654 *** (3.653)	-35.0956 *** (3.5659)
_cons	0.0065 *** (0.0013)	0.0092 *** (0.0012)	0.0089 *** (0.0012)	0.0092 *** (0.0012)	0.0085 *** (0.0013)	0.0864 *** (0.0213)	0.2143 *** (0.0164)	-0.0285 *** (0.0058)	-0.0225 *** (0.0054)	-0.022 ** (0.0106)	-1.5691 *** (0.1385)	0.3035 *** (0.0966)	0.2485 * (0.1422)	0.3225 ** (0.1397)	0.2341 (0.1483)
R ²	0.1806	0.1474	0.1469	0.1463	0.1498	0.4286	0.4554	0.4285	0.4297	0.4285	0.5608	0.1386	0.6370	0.6351	0.6322
观测值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第二,制度变迁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市场化指数与企业家创业精神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大众创业”,因为市场化的关键是市场配置资源、主体的公平进入和竞争,这会刺激企业家将识别的市场机会付诸实现。令人疑惑的是,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与企业家创业之间的关系亦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质量普遍较高,能够提供鼓励创业的政策导向和财政补贴,从而促进创业。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政府主导发展未见得不好,这与政府质量有关,比如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德国的政府主导模式等。金融发展与企业家创业精神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增多、产品的多样缓解创业的融资约束;二是通过竞争打破金融行业的垄断结构,从而刺激创业活动的活跃。开放程度与企业家创业精神显著负相关,原因可能有:一是由于国内当前的技术、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欠缺,不少市场需求为进口产品所替代;二是长期的从事加工贸易产生了“锁定效应”,衰弱了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的能力,也抑制了其承担创业风险的冲动。城市化水平与企业家创业精神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因为这可能还会受到融资、技能等因素的约束。

第三,制度变迁与企业家精神配置。市场化指数与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关系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诱使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领域配置。这很好理解,因为市场配置资源以及公平准入、平等竞争势必会减少企业家精神配置到非生产性领域而获利的可能,这也与 Sobel(2008)的观点一致。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与企业家精神配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配置资源的情况,政府拥有和配置的资源越多,越会产生寻租、腐败以及由于信息不对称、知识缺失所产生的资源错配等现象,这将会鼓励企业家精神配置到非生产性领域。金融发展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显著为正,其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金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府所掌握的一些资源,如财政、土地等的替代,从而降低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二是金融市场化使得通过政府协助获得金融资源的途径可能不再走得通了。开放程度与企业家精神配置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开放也是一种改革,为了参与全球分工、资源配置

和国际竞争,我国政府已经或正在进行两项改革:一是简政放权;二是负面清单管理,这将极大地促使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城市化水平与企业家精神配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城市等级与市场化程度往往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城市等级越高,市场化改革相对越彻底,从而寻租和腐败的空间越小。

第四,其他控制变量。企业家创新精神。资源禀赋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显著为正。有一种观点认为,丰富的资源禀赋对于创新具有挤出效应。但事实上,资源禀赋作为一种比较优势或劣势与企业家是否愿意创新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其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传导机制,即腐败程度、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与企业家创新精神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在市场,特别是要素市场分割的背景下,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于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因为只能依靠本地提供。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来说,充足的资本和劳动力势必会削弱企业家的创新意愿,类似于“资源诅咒”。此外,教育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显著为正。企业家创业精神。资源禀赋与劳动力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并不确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创业企业的类型差异会对要素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张维迎、盛斌,2004)。资本存量、教育水平与企业家创业精神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是影响创业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资本和知识。基础设施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显著为负,原因可能在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区位优势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从而促进本地“打工经济”的发展,相反,相对较差的区位优势更有助于激发企业家的创业潜能。企业家精神配置。事实上,企业家精神的配置方向与要素禀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资源禀赋、资本存量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并不确定。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与企业家精神配置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因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可能会通过要素集聚以及要素高级化来推进市场化进程,从而鼓励企业家精神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劳动力与企业家精神配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人均资源的稀缺性、竞争的激烈性可能会因为寻求博弈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诱使企业家精神配置到非生产性领域。

2. 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

(1) 计量模型。为了检验企业家精神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private - economy_{it} = \beta_0 + \beta_1 entrepreneurship_{it} + \theta X_{it} + \xi_{it} \quad (2)$$

其中, i 表示地区, t 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 $private - economy$ 代表民营经济发展,具体包括总量规模、产业结构、创新驱动以及价值链地位四方面指标;解释变量 $entrepreneurship$ 表示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配置三个方面; X 为控制变量的合集,包括资源禀赋、资本、劳动力、教育水平以及基础设施五个方面; ξ 为随机误差项。

首先,计算各主要解释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发现相关系数均小于 0.4,没有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考虑到企业家精神与民营

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以及方程也许遗漏的某些变量,这里选择采用面板工具变量(IV)法进行估计以规避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制度变迁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这一做法的好处在于:可以解释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来自于制度变迁,而不是其他途径。为了得到合理的工具变量,本文逐个加入市场化指数($market$)、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expenditure$)、金融发展($finance$)、开放程度($trade$)以及城市化水平($urban$)并结合 Hausman 内生性检验和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来确定最终选择。最后,将市场化指数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2) 实证结论。根据表 3 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 3 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关系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面板 IV 估计)											
	private			structure			new			profit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8	方程 9	方程 10	方程 11	方程 12
<i>R&D</i>	88.5758 *** (9.4909)			60.9432 *** (10.695)			7.3634 *** (1.5692)			-7.0073 *** (2.0572)		
<i>selfemployment</i>		4.5887 *** (0.5584)			3.1572 *** (0.7072)			0.3815 *** (0.0937)			-0.363 *** (0.1279)	
<i>state</i>			0.2717 *** (0.0092)			0.187 *** (0.0332)			0.0226 *** (0.0048)			-0.0215 *** (0.0066)
<i>resource</i>	-0.0545 *** (0.0176)	0.0743 *** (0.0132)	0.0128 *** (0.0023)	0.0361 ** (0.0152)	0.1247 *** (0.0188)	0.0824 *** (0.0103)	-0.0111 *** (0.0021)	-0.0004 (0.0021)	-0.0055 *** (0.0011)	-0.0016 (0.0018)	-0.0117 *** (0.003)	-0.0069 *** (0.0016)
<i>capital</i>	0.7170 *** (0.1049)	-0.6057 *** (0.1600)	0.1424 *** (0.0264)	0.4028 *** (0.1351)	-0.5073 ** (0.2145)	0.0074 (0.1206)	-0.0813 *** (0.019)	-0.1912 *** (0.0238)	-0.129 *** (0.0158)	0.0896 *** (0.0238)	0.1942 *** (0.0514)	0.1351 *** (0.0322)
<i>education</i>	-0.8840 ** (0.3876)	-0.2417 (0.3998)	0.195 *** (0.0619)	-0.485 (0.4237)	-0.043 (0.472)	0.2574 (0.3449)	0.1641 * (0.0853)	0.2175 ** (0.0924)	0.2538 *** (0.0831)	0.2037 *** (0.0555)	0.1529 *** (0.0597)	0.1183 *** (0.0423)
<i>infrastructure</i>	-0.1239 (1.4482)	5.4563 *** (1.3654)	0.5928 *** (0.1802)	-3.5343 *** (0.9855)	0.305 (1.5662)	-3.0413 *** (0.9614)	0.1522 (0.2329)	0.616 ** (0.2407)	0.2117 (0.2231)	-0.1693 (0.1236)	-0.6108 *** (0.2365)	-0.226 ** (0.105)
<i>population</i>	-3.1390 *** (0.7389)	-1.1982 * (0.6648)	-0.2279 *** (0.0888)	-1.8997 *** (0.6024)	-0.5644 (0.6066)	0.1032 (0.3854)	0.0222 (0.0677)	0.1835 * (0.0987)	0.2642 *** (0.0721)	0.3161 *** (0.1048)	0.1626 * (0.0884)	0.0858 * (0.0473)
<i>_cons</i>	-0.6602 *** (0.0871)	-0.8883 *** (0.1292)	-0.0654 *** (0.0114)	0.7077 *** (0.1056)	0.5508 *** (0.1713)	1.117 *** (0.0661)	0.0674 *** (0.0154)	0.0485 ** (0.0212)	0.1169 *** (0.0099)	0.0401 *** (0.0135)	0.0581 *** (0.0221)	-0.007 (0.0126)
R^2	0.5243	0.2845	0.8606	0.2243	0.2845	0.2000	0.1616	0.1868	0.1830	0.1266	0.2845	0.1885
观测值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第一,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规模。企业家创新精神与民营经济规模显著正相关,这与理论相符。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

论,均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企业家创业精神与民营经济规模显著正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创业,特别是科技创业已经成为推动

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主要有两条作用途径:一是创造就业;二是知识的产业化。以上两点结论与李宏彬等(2009)的实证结果完全一致。企业家精神配置与民营经济规模显著正相关。根据 Baumol (1990)的观点,企业家精神越多的向生产性领域配置自然会促进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张。

第二,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产业结构。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配置均与民营经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似乎说明企业家精神越是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创新意愿越强烈、创业活动越活跃,民营经济中二次产业的比重就越高。然而,更令人疑惑的是,经过基于动态面板 GMM 估计的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结论却恰恰相反,即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配置均与民营经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家精神对于产业结构的确是存在影响的,其影响的具体途径和机制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有过详细的描述,但是,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方向却是不确定的。比如创新可以通过收入分配效应、创新投入结构、要素结构来影响产业结构;创业可以通过新部门的产生、收入分配影响产业结构;企业家精神配置可以通过配置的部门方向影响产业结构,但是企业家精神没法决定何种产业部门“消”,何种产业部门“长”。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哪个产业部门能带来的利润更高,哪个产业部门就能吸引到企业家精神的配置、创新和创业。因此,决定民营经济产业结构演变方向的根本因素应该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企业家精神只是实现这一演变方向的重要力量。

第三,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创新驱动。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配置与民营经济创新驱动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其中,从系数比较来看,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于民营经济创新驱动的积极影响最大。企业家创新意愿对于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这一结论在国外被广泛证实(Dundas 等,2009),然而对我国的实证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原因大多被归结为:补贴方式的不完善、补贴分配的错配、项目设定的不科学、经费管理的不合理等。本文这一结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创新补贴不论是初始意愿,还是分配结果都更多的针对的是国有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机构,民营企业的创新由于主要使用了自有资金,效率相对更高,也更

有针对性,从而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创业之所以对民营经济创新驱动具有正向作用,主要因为创业源自于三方面动力:一是发掘了空白市场,二是设计、生产了新产品,三是更低成本、更有效率的生产现有产品,而这些正是创新驱动的主要内容。企业家精神配置对创新驱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竞争机制实现。更多的专注于生产性领域,将迫使企业必须更多地进行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更多的专注于非生产性领域,一方面会因此而产生创新惰性,另一方面也会降低通过寻租获得的垄断收益的使用效率。

第四,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价值链攀升。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配置与民营企业利润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创新精神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伤害最大。企业家创新精神之所以对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或价值链攀升具有负面作用,可能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价格的上涨,加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不景气,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些会导致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二是创新能力的制约使得创新投入的边际产出下降,从而降低企业盈利能力。三是不少民营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或 FDI 的配套生产,极可能被低端锁定,陷入“微利化”陷阱,即使创新意愿很强烈,但是盈利能力却在下滑。四是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很多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已经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非颠覆性的创新很难改变盈利能力下降的颓势。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消极作用主要可能源自于过度进入和恶性竞争。由于产业政策等原因,国内企业家容易对少数行业普遍看好,进而“潮涌”进入,造成产能过剩危机,拉低了行业平均利润率。此外,如果进入的是成熟期或衰退期行业,将进一步加剧盈利能力下降的态势。企业家精神越多的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反而会造成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技术水平的低下,企业家精神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同质化生产,加上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以及通过寻租获得的垄断收益的消失,势必造成企业至少在短期内出现盈利能力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区的民营企业热衷于寻求政治关联的重要原因。

第五,其他控制变量。民营经济规模。基础设施对民营经济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观点

也已被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进行证实,主要有两大促进机制:一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直接促进增长;二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间接促进增长。人口禀赋与民营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人口老龄化,人口总数虽多,但劳动力减少;二是从生产理论来看,劳动力拥挤也是造成其贡献为负的重要原因;三是劳动力价格的大幅上涨,数量越多,成本越高。此外,资源禀赋、资本存量以及教育水平对民营经济规模的影响并不确定,这可能与民营企业的类型高度相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对民营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从事与此相关的第二产业。基础设施、人口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从理论上讲,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对地租、要素价格等生产成本更为敏感,而服务业则对交易成本更为敏感,因此,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往往布局更多的是服务业;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就业弹性更大,更能吸纳就业,故人口越多的地区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将越高。此外,资本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确定,教育水平则不显著。创新驱动。资源禀赋、资本存量与民营经济创新驱动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说明挤出效应明显。人口、教育、基础设施对民营经济创新驱动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从而越是刺激创新;知识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因此教育水平越高,创新驱动能力越强;基础设施和区位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越是能吸引高级生产要素集聚,从而促进创新驱动。盈利能力。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对民营经济盈利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丰富的资源禀赋一方面会产生“资源依赖症”,降低创新意愿,另一方面会将产业选择锁定在比较优势行业,但比较优势会发生衰减,产业生命周期也会进入衰退;良好的基础设施也会对创新产生“替代效应”,从而降低盈利能力。资本存量、人口、教育水平与民营经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较多的资本存量、人口数量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教育水平越高,越是能发现市场机会,也越有创新能力,从而提升盈利能力。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企业家精神对民营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基于动态面板 GMM 的再估计。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的另一种重要的回归方法就是动态面板 GMM 估计,如果扰动项存在异方差或自相关,那么 GMM 将是比面板 IV (即 2SLS) 更有效的估计方法。根据表 4, Wald 检验、AR(2) 检验以及 Sargan 检验表明,几乎所有方程误差项都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且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选择有效。考察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变量符号,除了对民营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一致外,其余符号均完全一致,主要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2) 剔除直辖市样本。考虑到直辖市的政治等级高于其他省份,其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可能远比一般地区要复杂,包含直辖市的样本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剔除这部分样本后的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同样支持本文以上结论。此外,考虑到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独特地位以及地区差异,本文还分别对剔除北京后的样本、剔除西部地区后的样本以及东部样本、中部样本、西部样本进行检验,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3) 制度变迁的重新度量。制度变迁是本文重要的工具变量,对其测度指标的不同选择是否会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 基于这一考量,本文重新选择了要素扭曲程度作为制度变迁的衡量指标。这里沿用 Dollar & Wei (2007) 的方法来测算各地区投入

要素的相对扭曲程度。即 $\theta_{K_i} = \frac{\varphi_{K_i}}{\sum_{i=1}^n \left[\frac{s_i \alpha_{K_i}}{\alpha_K} \right] \varphi_{K_i}}$, $\theta_{L_i} =$

$\frac{\varphi_{L_i}}{\sum_{i=1}^n \left[\frac{s_i \alpha_{L_i}}{\alpha_L} \right] \varphi_{L_i}}$ 表示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扭曲指数,其中,

s_i 为该地区在全国 GDP 中的比重, α_L 和 α_K 则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相对扭曲指数反映了要素使用的相对成本情况,利用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

$$\theta_{K_i} = \left[\frac{K_i}{K} \right] / \left[\frac{s_i \alpha_{K_i}}{\alpha_K} \right] \quad (3)$$

$$\theta_{L_i} = \left[\frac{L_i}{L} \right] / \left[\frac{s_i \alpha_{L_i}}{\alpha_L} \right] \quad (4)$$

式(3)和式(4)的含义就是要素实际投入占比与理论投入占比之比,最终检验结果与上文结论完全一致。

表 4 基于动态面板估计的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GMM 估计)											
	private			structure			new			profit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8	方程 9	方程 10	方程 11	方程 12
<i>R&D</i>	1.5068 *** (0.0981)			-18.2591 *** (1.2106)			2.4683 *** (0.0738)				-1.8613 *** (0.0903)	
<i>selfemployment</i>		0.1925 *** (0.0217)			-0.6331 *** (0.1001)			-0.0068 (0.0112)			0.0194 (0.0057)	
<i>state</i>			0.1628 *** (0.0031)			-0.1586 *** (0.0213)			0.0131 *** (0.0020)			-0.0006 *** (0.0013)
Wald 检验	386383.69 [0.0000]	1.12e+06 [0.0000]	166192.71 [0.0000]	2497.37 [0.0000]	1880.54 [0.0000]	1306.78 [0.0000]	3.86+06 [0.0000]	1.51e+06 [0.0000]	1.50e+06 [0.0000]	101377.66 [0.0000]	754372.48 [0.0000]	452112.66 [0.0000]
AR(2) 检验	0.6774 [0.4982]	1.2402 [0.2149]	2.4267 [0.0152]	-1.6598 [0.097]	0.2946 [0.7683]	0.3503 [0.7261]	-1.0196 [0.3079]	-1.0173 [0.3090]	-1.0169 [0.3092]	-1.0452 [0.2959]	-0.9373 [0.3486]	-0.9379 [0.3483]
Sargan 检验	25.4493 [0.4374]	25.9405 [0.4108]	26.5984 [0.3762]	29.4036 [0.2474]	30.1400 [0.2191]	29.9788 [0.2251]	28.4226 [0.2888]	28.9726 [0.2651]	28.6707 [0.2779]	30.1985 [0.2169]	29.3586 [0.2492]	29.5461 [0.2417]
观测值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由于篇幅限制,滞后项、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系数没有列出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表 5 剔除直辖市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面板 IV 估计)											
	private			structure			new			profit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方程 6	方程 7	方程 8	方程 9	方程 10	方程 11	方程 12
<i>R&D</i>	71.4027 *** (14.9778)			25.4246 (17.7565)			16.3308 *** (3.0089)				-18.7013 *** (5.1615)	
<i>selfemployment</i>		10.1529 *** (6.7810)			3.6152 (4.2175)			2.3221 (1.6168)				-2.6592 (2.1677)
<i>state</i>			0.2439 *** (0.0168)			0.0868 (0.0628)			0.0558 *** (0.0083)			-0.0639 *** (0.0191)
<i>_cons</i>	-0.4940 *** (0.0806)	-1.5758 * (0.9191)	-0.0472 ** (0.0225)	0.8879 *** (0.1067)	0.5027 (0.5713)	1.0470 *** (0.0959)	0.0264 (0.0196)	-0.2210 (0.2198)	0.1286 *** (0.0124)	0.0518 (0.0197)	0.3351 (0.2857)	-0.0652 ** (0.0271)
<i>R</i> ²	0.5122	0.2728	0.8838	0.1012	0.2728	0.1487	0.5122	0.2618	0.1730	0.5049	0.2166	0.6804
观测值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40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由于篇幅限制,滞后项、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系数没有列出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五、结论与建议

1. 基本结论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既是响应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本文以江苏为例,分析了民营经济演变、发展的内在机制,提出了“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即制度变迁所产生的激励结构变化将诱使企业家精神的配置方向、释放程度发生演变,进而通过影响企

业的创新行为、创业行为两个渠道来引导民营经济规模、结构、创新等的塑造与发展。进一步地,以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方面,制度质量的提高、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对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领域的配置程度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领域的配置程度:(1)对于民营经济的规模壮大、创新驱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对于民营经济盈利能力或价值链地位具有负面影响,这可能与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过度进入与恶性竞争、技术水平低下、产业生命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3)对于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决定于产业平均收益。

2. 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现状判断、特征分析以及实证结论,本文认为,以江苏为典型代表的民营经济应着力向三个方向进行提升:一是培育一批拥有自主品牌的大企业,尤其是充当国内价值链“链主”的跨国企业;二是提高民营经济中现代服务业比重,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三是实现民营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为此,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进一步地优化,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行和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江苏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通过集中有限资源实现了民营经量的扩张,但同时也产生了产业结构同质、企业多而不强等问题。要提升民营经济的质必须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优胜劣汰。与此对应的就是要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具体要制订“政府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以及“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行政审批平台,增强部门协同,实现“一站式”办理和“全流程”监督。从而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以及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预。

第二,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兼并重组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表现,也是提高市场集中度的主要手段。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的大企业、跨国公司在其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兼并重组。美国曾经发生过六次企业兼并重组浪潮,而我国目前为止一次都没出现,这与地方竞争导致的政府干预密切相关,即使在省内的不同省辖市,跨市企业并购可能都存在制度性障碍。应尽快消除这种政府间的行政壁垒,并以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为目标,建设一批如产权、技术、金融资产、知识产权、环境等交易平台,完善治理结构,整合交易资源。

第三,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的核心功能实际上是遴选出最优秀的企业家,研究表明,欠发达的金融体系会压抑一国的企业家精神。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江苏民营经济发展:一是缓解流动性约束,二是通过资本流动诱导产业结构优化,三是利用风险分担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主要存在结构不合理(银行主导型),行政化、计划化、审批化色彩浓厚等问题。应加快构建、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重点发展新三板市场,将挂牌范围扩大到全国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主要看主营业务和盈利前景,建立和完善转板机制,实行注册制。

第四,形成吸纳高级人才的制度体系。吸收、利用高层次人才是江苏民营经济提档升级的核心变量,需要重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消除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比如完善户籍政策,取消落户限制;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制度;健全配套保障机制,努力为高层次人才提供社保、医疗、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出入境等综合服务。二是虹吸海外高级要素为我所用。鼓励通过发展逆向外包,以及进行海外并购或投资新办企业,来吸收国外高级要素弥补技术缺口,实现产品创新和价值链升级。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Egorov, Sonin. Political Economy in a Changing World[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5, (5): 1038 – 1086.
- [2] Barro, Robert J. Democracy and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 (1): 1 – 27.
- [3] Baumol, W.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 893 – 921.
- [4] Boyd, Richerson.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5] Dollar, Wei. Firm Ownership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03, 2007.
- [6] Garelo. Tax Struc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4, (42): 165 – 190.
- [7] Hebert, Link. 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89, (1): 39 – 49.
- [8] Jacobs.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if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 [9] King, Levine.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 (32): 513 – 542.
- [10] Lu, Tao.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25): 261 – 273.
- [11] Nola Hewitt-Dundas, Stephen Roper. Output Additionality of Public Support for Innovation: Evidence for Irish Manufacturing Plants[R]. ISSN 0964-9328-CSME Working Papers No. 103, 2009.
- [12] Sachs, Demurger, Woo and Bao.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Loc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nd Having the Right Incentiv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444 – 465.
- [13] Shih, V. *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 Elite Conflicts and Infla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4] Sobel, S. Testing Baumol: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8, (23): 6411 – 655.
- [15]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M]. New South Wales: Allen and Unwin Press, 1930.
- [16] 包国宪, 李毅. 中国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基于负担贡献模型[J]. *北京: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 (2).
- [17] 才国伟, 钱金保, 鲁晓东. 外资竞争、行政效率与民营经济发展[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2, (7).
- [18] 程俊杰, 刘志彪. 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江苏模式: 背景、特色及其演进[J]. *南京: 江苏社会科学*, 2012, (1).
- [19] [美]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 [20] 丁任重, 孙根聚. 新时期我国民营经济的转型与发展[J]. *北京: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 (12).
- [21]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22] 韩坚, 钱濛. 并购重组与民营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以江浙沪民营上市企业为例[J]. *北京: 中国软科学*, 2012, (7).
- [23] 洪银兴. 以改革支持实体经济领域民营经济的发展[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2012, (2).
- [24]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张海峰, 张俊森. 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9, (10).
- [25] [美]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26] 张杰, 郑文平, 翟福昕. 竞争如何影响创新: 中国情景的新检验[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11).
- [27] 章奇, 刘明兴. 民营经济发展地区差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来自浙江省的证据[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2, (7).
- [28] 张维迎, 盛斌. *论企业家: 经济增长的国王*[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04.
- [29] 褚敏, 靳涛. 民营经济发展存在体制内阻力吗? ——基于政府主导和国企垄断双重影响下的发展检验[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 (8).

Institution Evolu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CHENG Jun-jie^{1,2}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supply side. B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vate economy in China is getting worse. Since January this year, the investment of private sector has declined dramatically. From January 2016 to May, private investment has only 3.9% year-on-year growth and the risk of recession is gradually increas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fundamental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entrepreneurship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of private economy in number and scale, operating efficiency, industrial structure, statu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tc.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he key factor which causes entrepreneurship evolved. Taking southern part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ncluding: the scale of private economy is large,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y is high,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active,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ability is strong and so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nd proposed institution evolution will change the allocation direction and degree of entrepreneurship which will affect the scale,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of private economy throug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also applies in other areas, and the difference only lies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which caused by institution and its evolution.

In order to verify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private economy, this article use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4 for empirical research.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found that: First, th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degree of allocation to production areas. Seco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degree of allocation to production areas: (1)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cale of private economy and driven by innovation; (2) have a for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private economic; (3)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direction decided by industry average retur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private economy in our country represented by Jiangsu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in three directions: one is to foster a batch of large enterprises with independent brands; two is to raise the proportion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develop producer services; three is to use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So we need to further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ntroduce and improve the negative inventory management. Greatly reduce the government's direct configur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management and intervention of micro affairs. Second, encourage corporate merger and acquisi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eliminate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set up a number of trading platform such as property rights, technology, financial asse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nvironment and so on. We nee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sources integration. Third,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multi-level financial market system. Fourth, form systems of absorbing advanced talents. Eliminate barriers to the free flow of talents, and encourage absorbing foreign advanced elements to make up the technology gap by developing reverse outsourcing and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r investment.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alize product innovation and value chain upgrade.

Key Words: institution evolution; entrepreneurship; private economy; south of jiangsu

(责任编辑:月 才)